

印象·上海

街道背后

海上地名寻踪

薛理勇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印象·上海

街道背后

海上地名寻踪

薛理勇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街道背后: 海上地名寻踪 / 薛理勇著.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608-3736-9

I. 街… II. 薛… III. 地名—简介—IV. K9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5884 号

街道背后——海上地名寻踪

著 作 薛理勇

出版策划 萧霏霏 (xff66@yahoo.com.cn)

责任编辑 陈立群 (clq8384@126.com)

视觉策划 育德文传

装帧设计 昭 阳

电脑制作 宋 玲 唐 斌

责任校对 谢惠云

出 品 郭 超

出 版
发 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制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规格

185mm × 213mm 240 面

字 数

3380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3736-9/K · 65

定 价

38.00 元

序 言

地名是地理实体的名称，往往与该地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能反映城市发展、变化的种种信息。同时，对地名的命名也往往能反映时代的特征。古代地名的命名经常是以山川、河流、建筑、社会百业、名门望族等等为来源，而现代社会命名对象则越来越体现出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甚至会因文化交流的强化而留下强烈的外来文化的烙印。透过这种地名命名方式的变化，人们可以了解各个时代的社会状态，人们在想些什么、忙些什么，地名由此获得了类似痕迹物证的价值，成为了解历史的重要无形线索。地名承载着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地名蕴涵着一座城市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城市的面貌总是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地被新的面貌所代替。旧貌不在，但如果地名依旧，人们就仍能从这一线索中读出城市中那些曾经有过的一个个故事，就仍能在地名中看到城市中那些曾经有过的一幕幕场景。只要“桃花依旧”，人们就还能依稀记得“人面桃花相映红”的那一幕。历史地名，当之无愧地属于城市的无形文化遗产。

当城市面临大片、快速“旧貌变新颜”时，在全社会以“变”为美、以“变”为进步的大背景下，那些千百年留存下来的、在今天还在使用着的地名就如同活化石般承担着其他载体难以承担的传达历史信息的作用。虽然乌衣巷早已风情不在，但只要地名还在，人们还是会回想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那一幕。同时，不同于那些宏大的有形文化遗产，历史地名恰恰是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成为联结历史记忆和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最好纽带。

当下上海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越来越深入人心，地名作为城市无形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方面，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善待从祖辈手中承继的城市遗产。在持续的大拆大建之后，在城市历史的痕迹越来越淡化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历史遗存对于当代生活的重要性。割断历史的“现代化”是残缺的现代化。痛定思痛，我们深感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风貌之急迫，对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保护的力度前所未有的。

另一方面，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失去的已不可能重生，以无形之痕迹补有形之记

忆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对历史地名的保护并不需要投入多少财力和人力，关键是转变观念，认识到位。当我们的城市新旧更替之后，那些还留存着的地名多少还能唤起我们那渐渐模糊的记忆。我们已不知道外婆桥的模样，但我们依然知道哪里曾有一座提篮桥、八仙桥或是泥城桥！当我们无可奈何地看着逝去的城市旧貌，地名也成了我们对这座城市记忆的最好寄托。

薛理勇先生在上海乡土史这片土壤辛勤耕耘多年，著作不断，以唤起民众历史记忆为己任。学术圈内他一向以书多书快而著称。多少人在他的书中了解了我们的城市，知道了我们城市昨天发生的故事。我一直是薛先生著作的忠实读者，长久以来我对他以师相待，获助良多。同时又由于志趣相投，总是一同为保护我们所热爱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而冲锋陷阵。现在，我成了我们这座城市地名工作的行政管理者，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地名对于一个城市的意义和地名研究的重要性。历史地名的挖掘、整理与保护是我们必须承担起来的历史责任！薛先生的工作既为我们的地名管理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专业支持，出版相关著作广为传布也是在普及传播地名知识，更是在为我们的地名保护和管理工作摇旗呐喊。

在他的新著《街道背后——海上地名寻踪》即将出版之际，我有幸成为第一读者，感到十分荣幸。薛先生嘱我为序，我当仁不让。相信这本书会像薛先生已有的著作一样，读者爱读；更相信这书为延续我们城市的历史记忆又增添了浓浓的一笔！

是为序。

上海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地名管理办公室主任

伍江

2007年12月31日

目 录

04	序 言
08	前 言
12	渔村·酒乡·大上海
15	上海历史上的界路
17	上海历史上的越界筑路
20	中山环路是如何形成的
23	中山环路沿线的路名特点
25	城墙踪影
30	牌楼印迹
34	慈善之路
38	宁波王氏与王家码头路
42	野野胡，皮老虎；小东门，十六铺
45	巡道街和梦花街
48	沪军营路与近代警察的诞生
52	四明公所和宁波路
57	两处斜桥今安在
60	黄浦滩头说黄浦
64	里里外外说“外滩”
67	领事馆和领事馆路
70	大自鸣钟今何在
73	陆深与陆家嘴
76	高桥有多高
78	苏州河畔觅桥踪
84	中远两湾城与历史上的“两湾一弄”
88	“垃圾桥”和“八仙桥”
92	有名无实“东新桥”
96	从洋泾浜到延安路
99	泥城桥·虞洽卿·西藏中路

104	通不了徐家汇的徐家汇路
106	肇嘉浜和肇嘉浜上的桥
110	从尚贤堂到尚贤坊
114	“坟山路”和淮海路的前世今生
116	军官路·环龙路·南昌路
119	美丽园 新康花园 步高里
122	租界内第一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道路
125	南洋公学·福开森·福开森路
128	静安寺和会吹气泡的井
132	大华饭店和南汇路
135	赫德路和哈同路
140	英皇子康脑脱访沪和与康脑脱路
143	新华路和哥伦比亚圈
147	中山公园今昔
150	闵行·闵行
153	上海的靶子场和靶子场路
157	“铁马路”忆旧
162	花园路上无花园
167	汉璧礼的身影
172	下海庙和提篮桥
175	体育会路和水电路的来历
180	广东人·粤东中学·广中路
183	虬江与虬江路
186	上海多伦路文化街
189	景星路上忆往昔
193	周家嘴和复兴岛
195	军工路的来历
197	大学的背影
201	江湾五角场与“大上海计划”
206	马玉山路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210	从“海上”到“上海”
212	旧上海路名西文中文对照表
232	旧上海以工部局、公董局总董人名命名的马路
232	旧上海以外国驻沪领事命名的道路表
233	1943年汪伪上海市政府制定的路名更名表
235	跋

前言

地名是地理实体的名称，地名的读音、含义、位置、沿革、变迁往往与该地区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而在一个大城市中，城市道路犹如这个城市的脉动，城市道路的名称及其沿革、变化往往就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变化、进步和发展。同样，城市道路名也往往是这个城市地名的主流。而上海更是如此。

城市道路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组成。所谓专名就是专用名称，而通名就是通用名称。如“南京路”中的“南京”就是专名，而“路”则为通名；“大兴街”中的“大兴”是专名，“街”即为通名。约定俗成，历史上中国许多城市道路的通名主要使用“街”、“巷”、“弄”之类的词，而且“街”通常用于城市中路面比较宽敞并有一定商业活动的道路，如许多城镇的居民习惯把兜市场、逛马路讲作“上街去”就是证明，我想，几百年前的上海人也一定是把“荡马路”讲作“上街”的；“巷”则多指比“街”狭小的居民区道路，所以成语才有“大街小巷”、“街头巷尾”之说，如果“街”上发生大事，老百姓纷纷出门观看，成语称作“空巷而出”，这也说明了“巷”的性质。“弄”即上海人讲的“弄堂”，关于“弄堂”名称由来有许多种说法，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弄”一般是“巷”的分支，也是居民居住集中的地方。

上海这个名称最初见于北宋的著录，北宋皇家编纂的《宋会要辑稿·食货》记录，当时的“云间”地区（相当于今上海和嘉兴地区）共有19个酒类的专买、征税、管理机构——酒务，其中就有“上海务”。大概到南宋咸淳年间，原“上海务”就正式称“上海镇”，一直到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镇又升格为“上海县”。明代，上海出现了专门记录上海县地方历史、文化的《上海县志》，《县志》中都设“街巷”一节。明《弘治上海县志》记录上海有道路5条，《万历上海县志》为11条，清《康熙上海县志》为25条，《嘉庆上海县志》为63条。虽然我们可以断定，《县志》记载下的道路可能会比实际数少一点，但是也不会相差很大，而所记录的道路名中的通名主要就是“街”、“巷”、“弄”、“坊”，并不见有以“路”作为通名的。由此也可以断定，今天上海以“路”作为道路通名确实是从近代开始的。

近代以前，上海也没有城市地名的管理机构，道路名称原则上采取约定俗成、自然成习惯的方式，以道路附近的建筑物得名，如“县前街”以县衙门得名，“巡前街”以巡道衙门得名，“馆驿弄”以驿站得名；以某豪门望族居住地得名，如梅家弄、唐家弄、姚家弄、张家弄之类。上海属江南水乡城市，于是历史地名中有许多是以河流和桥梁得名的。在历史发展和城市改造和建设中，许多“古迹”会被破坏，会湮没，于是保留或记录下来的历史路名就起着承载和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的作用，通过这些历史路名，依然可以刻画出城市发展的轨迹。

1842年清廷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沿海的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城市对外开放。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1848年，1849年美租界和法租界也相继建立，而到了1863年，英、美租界宣布合并，即后来的“公共租界”，在上海市区，租界以外的“中国地界”被叫作“华界”，而华界又被租界分割为“南市”和“闸北”两块，上海的行政被分割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南市、闸北，人们把上海行政分割的局面称之“三界四方”。

租界是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之外的殖民地，租界也是根植于中国封建国内的一个“资产阶级城市共和国”，他们以西方的城市模式加以规划、建设、管理，于是乎，租界与华界泾渭分明，租界是“十里洋场”，而华界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年代的城镇模式。

租界的最高市政组织、领导、管理机构的英文名为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如直译应是“上海市政委员会”，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市政”概念，汉字中也没有“市政”一词，中国人发现，这个Municipal Council与中国的县衙门、“父母官”不一样，专门管城市的规划、建设，倒与清中央政府六部中的“工部”很像，于是被汉译为“工部局”。工部局下设许多分管机构，道路的命名和更名也被纳入管理之中。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城市道路名也是专名加通名组成的，在英语系国家中，城市道路最常用的通名是road，而road的本义就是“路”，而road的发声又与汉语“路”十分相近，上海把城市道路的通名讲作“路”，应该与租界时期的road有密切关系。

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习惯上叫作“英、美租界”，它的英文名为Shanghai Foreign Settlement，1899年正式称“公共租界”，其英文名为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它是以英、美为主，多国参与的租界。于是，对租界内道路的命名牵涉多国的荣誉和利益，很难使用有利于某一国利益的道路命名方式。据记载，在1863年一次关于上海租界内道路正式命名的会议上，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曾任第一届工部局董事的麦都思（Water Henry Medhurst）提出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法，就是以中国的行政省和城市地名作为上海租界道路的专名，如今上海的不少路名，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四川路、江西路、浙江路等就是当时命名的道路，这也为以后上海路名以中国行政地名作专名的特色打下了基础。20世纪初，杨树浦一带被划进公共租界后又筑了许多马路，租界当局又通过一项关于杨树浦地区道路命名的基本方法，就是以南洋国家的城市名作该地区道路的专名，于是这里出现了如卡拉处路（眉州路），苏尔路（西湖路）、甘达赫路（临青路）、山大根路（定海路）、加尔各答路（杭州路），马拉斯路（平凉路）、孟买路（河间路）等路名。不过使用几年后，工部局发现中国人对这些地名很陌生，使用起来很不习惯，于是在1915年时，将

这里以南洋城市命名的路名一律改用中国行政地名。

以前我写过不少涉及上海路名的文章，也出版过专著，近年，我被邀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首席嘉宾，在节目中也多次介绍上海路名的典故和特点，于是也收到几位老先生的来信和来电，他们认为，公共租界采用中国行政地名的狼子野心是想以这种方式“囊括”中国。我无言以对，或难以回答。实际上，从如今黄浦区保存的路名来看，这些路名涉及的中国行政省或城市主要是中国沿海和沿长江的城市地名，而且大部分是《天津条约》规定开放的城市及附近的城市名，这当然包含列强们庆祝他们在“二鸦”中的胜利和获得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包括在沪侨民对这些城市的名字比较熟悉。

法租界是法国独家控制和经营的租界，所以，他们的租界内道路命名不受他人的制约，所以，法租界的路名几乎不使用中国行政地名，而主要使用法国在华（或与中国有过关系的）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人、公董局总董的人名为路名。上海保留下来的法文档案和资料很多，但上海精通法文的人实在太少，而通法文又从事上海史研究的人几乎“凤毛麟角”，这就决定了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的水平，所以，上海法租界的路名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华界的南市是从老城发展过来的，道路及路名的变化不是太大，而闸北则是从19世纪末以后逐渐形成的城市建成区。最初，闸北的路名取名也是以约定俗成的方法，如广肇路（今天目西路）是以通广东人坟山——广肇山庄而得名的；新大桥路（今恒丰路）以新大桥（又称舢板厂桥，即恒丰路桥）北堍的路而得名；总局路（今共和路）则是以原闸北工巡总局（即今公安局闸北分局）门口的马路而得名。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中华民国以汉、满、蒙、回、藏为“五族”，表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并以红、黄、蓝、白、黑五色合成的“五色旗”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1912年后，闸北的地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出现了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汉中路、满洲路（1947年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英雄谢晋元而重新命名为晋元路）、蒙古路、新疆路、西藏北路（是公共租界西藏路的北延长线）；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辛亥革命政治口号相符的路名，如共和路、光复路、大统路、新民路、恒丰路等。

中华民国建立后，闸北的市政发展较快，城市道路也迅速增加，新命名的路名也多带有祝愿中华民族昌盛、吉祥的意义，如：中兴路、永新路、中华新路、鸿兴路、民主路、民德路、华盛路、华昌路、宝昌路、同济路（今同兴路）、隆昌路（今花园路）等。

旧时上海的行政被割裂为“三界四方”，且各有自己的道路取名、命名方式和权利，上海的路名可以用五花八门，杂乱无章形容，而且同名的道路也不少，如公共租界有“宁波路”，法租界也有一条“宁波路”（今

淮海东路)，公共租界有“舟山路”，法租界也有“舟山路”（龙潭路），而被叫作“交通路”的就有4条之多；此外，同音和谐音路名就更多了，如苏州河南岸的租界有“大通路”（今大田路），北岸就是“大统路”，这给通讯和市民生活带来许多麻烦和不便。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日军进驻租界。1943年7月30日和8月1日汪伪政权在日军支持下收回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抗战胜利后，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再行举行租界收回仪式），为表示他们也是“爱国主义”者，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于1943年10月8日发布《沪市四市第12486训令》称，“查本市一、八两区及以前越界筑路路名多用西文，兹者租界收还，亟应更正，以肃视听。现经制定更正路名表，看自本年十月十日起一律改用新名。”这是上海的一次规模性道路更名，更名道路约240条（参见附表），原租界内道路及越界筑路的以外国人名、地名为道路专名的路名几乎被全部更换，不过，有一条以日本首都命名的“东京路”（今昌化路）并未被更改，这也足以说明汪伪的投日决心。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又分几次布告，更改了部分路名，如把汪伪定的正阳路、嘉定路、象山路、黄山路以蒋介石名改为中正北一路、中正北二路、中正南一路、中正南二路；把东泰山路、泰山路、庐山路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名更改为林森东路、林森中路、林森西路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其中以反动派人名命名，或名称易于混淆者，现已重新订定，改用革命策源地及重要战役地址等名称，并于本年五月廿八日起更易……”把原中正东路、中正中路、中正西路改名为延安东路、延安中路、延安西路；把中正北一路、中正北二路、中正南一路、中正南二路更名为石门一路、石门二路、瑞金一路、瑞金二路；把林森东路、林森中路、林森西路更名为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路名是地理实体的名称，规范、科学、合理地管理路名，有利于市民生活，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同时，上海市区路名的得名、取名，命名也折射出上海城市的发展轨迹，从另一个角度叙述上海的历史、文化。拙著谈不上专业的著作，但希望通过上海路名的变化，叙述上海城市发展和进步中的一个一个小故事，引起大家对上海历史的兴趣。

薛理勇

2007年8月1日 写于秋月枫舍

渔村·酒乡·大上海

现在，不少人一提到上海城市的雏形，总喜欢讲：“上海是由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此话实在太笼统。江南是水乡，多河流湖泊，似乎任何一个城市的发端都可以与“渔村”搭点界，沾点边。把上海的发端与“渔村”联系起来，是出自后人对上海的简称——“沪”的误解。

吴淞江是古代太湖流域最大的河流，也是流经上海最大的河流。受潮汐影响，吴淞江有规律地涨潮和落潮，落差可达三四米。古代渔民就利用这一规律，用竹子编成一种竹栅插入江中，上半截可翻折，涨潮时鱼虾被冲入竹栅内，而退潮后被拦入栅内，渔民可划一小舟，在竹栅内“拾”鱼。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的《渔具诗·序》中把这种竹栅叫作“沪”。

陆龟蒙是吴江人，即今苏州用直人，今用直还有他的墓，所以古代的“沪”是指吴淞江，而不是上海，如北宋《吴郡图经读记》：“淞江（即吴淞江）东下海，曰沪渎，亦曰沪海。”“渎”即江河出口处的意思，所以全句可以理解为：吴淞江东流注入大海，出海口的地方叫“沪渎”，也叫“沪海”。这里的“沪”显然是指吴淞江。晋代时，在吴淞江靠近海的地方修建了一个军事堡垒，叫作“沪渎垒”，这个沪渎垒与上海较近，一直到清代，才有人把上海叫作“沪城”，所以上海简称“沪”出自那个沪渎垒，而不是古代的渔具，上海称“沪”与渔民也实在没有太大关系。

北宋编著的《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酒曲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秀州旧石城，及青龙、华亭……上海……十七务，岁十万四千九百五十二贯，熙宁十年（1077年）租额一十一万七千八百九贯七十三文。

这是北宋的征税记录。秀州是州名，相当于今天的浙江嘉兴地区，州治即今嘉兴市，青龙（镇）是吴淞江边的一个商业重镇，唐代属华亭县（即今松江），明代置青浦县时，曾为青浦县治，今称“旧青浦”。这段文字说：秀州旧城，及华亭、青龙、上海等17个酒的管理和征税机构，每年征酒税14 952贯。显然，这里的“上海”就是今天的上海，这

是目前所知道的“上海”地名的最早记录，距今约一千年。“上海”不是渔村，而是“酒务”——酒业的生产、管理、征税地。

江南产米，自然也产酒，在上海县或上海镇建立前的几百年，上海已是一个酒务，所以把上海城市的雏形称为酒乡也许更确切。

张蕴，字仁溥，邗州(今江苏扬州附近)人，大约生活在南宋理宗时期(1225-1264)，《南宋六十家集》收录他的《斗野稿支卷》，其中有《上海》诗一首，这是目前所知最早以“上海”为题的诗咏，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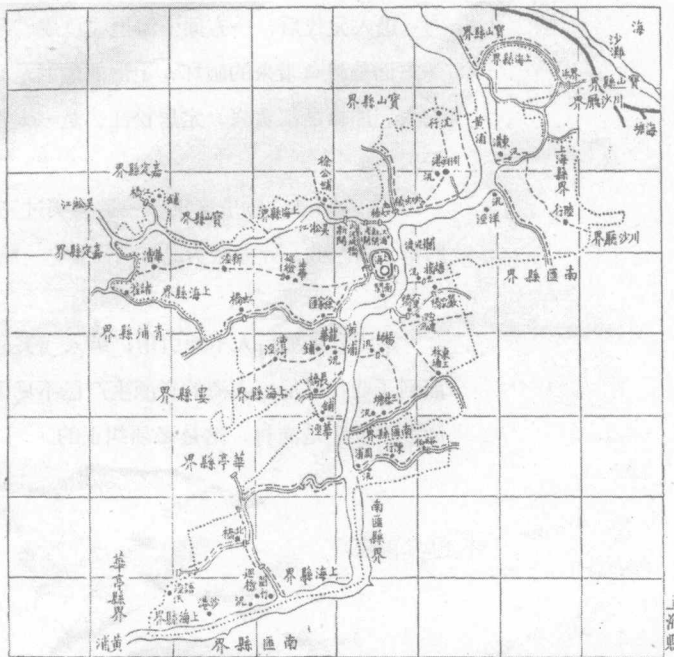
梦醒三更鹤，芦边系短裙。
听潮看海月，坐石受天风。
物至秋而化，年来我亦翁。
长歌相劳事，犹喜此樽同。

诗人半夜被鹤唳惊醒，于是系着短裙到江边，望着海上一轮明月，倾听潮水拍岸的声响，享受大自然的天外来风，不免触景生情，岁月流逝，老冉冉之将至，唯有对酒当歌，可至永远。这不是“饮酒歌”，但“酒”与“上海”，“上海”与“酒”就那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明朝松江人何良俊(元朗)《四友斋丛说·卷十》中有这样一段话：“青龙(镇)自唐宋以来，是东南重领地，相传有亭桥六座，亦通海舶；由白鹤江导吴淞江出海，宋时设水官于此，盖以治水利兼领海舶也。宋时卖官酒，酒务亦在此。江南所卖官酒，皆于此制造。入我朝来，水道湮没，而此地遂为斥卤矣。”

宋代江南销售的官酒是否全是青龙酒务生产的，未必可信，但酒务是酒的生产地则是可信的。上海显然也是江南官酒的生产基地。南宋末年，吴淞江淤塞严重，由于江水的排量日益下降，使海潮溯江而上的程度日益加剧，近海口的江水变咸，不宜酿酒，上海地区的酿酒业日益衰落。

清末上海县全境测绘图



在今上海西部有几个叫“瓶山”或“韩瓶山”的地名，这些地名都是以这里曾堆积大量的韩瓶而得名。即使在今天，耕作时偶尔也会挖到这种韩瓶。韩瓶是介于瓷与陶之间的青灰釉瓶，形状多为大腹小口、沿口有钮的瓶，容积约为一升（一升为1000毫升）左右。韩瓶得名于宋末抗金名将韩世忠，似乎没有异议。而对于韩瓶在当初的用途，就有了分歧。一说以为，当年韩世忠率部驻扎江南，江南多河流湖泊，韩瓶相当于今天的“救生衣”，将空瓶捆在士兵身上，可以助其涉水渡河。另一说以为，韩瓶就相当于现在的酒瓶。与韩世忠同时代的赵彦卫著《云麓漫钞》中这样讲：宋建炎年间，韩世忠的韩家将驻守江南。韩世忠带兵有一套，他先从部队里通过比武方法选拔出一批勇猛的士兵，再把这些士兵组成“亲随军”，也叫作“背危”。“一入背危，诸军统制而下，与之抗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攻坚，遣背建军，无有不破者。”接下来又讲：“燕北人呼酒瓶罍，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一姓范的参政）使燕，见道人中有负寇者，则指云：‘此背寇也。’以名军。寇即罍，北人语误。”

原来，韩世忠的亲随军还负责背运大将的酒瓶，部队到那里，酒瓶也背运到那里，北方人把酒瓶讲作“罍”，发音近“攫”，于是被人误听为“背心”而所谓“背磋”，就是“背酒瓶的士兵”。上海地区如此多的韩瓶是装酒的酒瓶是不会有问题的。

进入元代后，一方面上海地区已成“斥卤”之地，水质含碱盐量高，不宜酿造。另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破坏，上海的酿酒是日益衰落。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元末明初人。原籍浙江黄岩，定居松江，是一大学问家。其《南村辍耕录》收录时人写《行香子》，词云：

“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过三觔。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者，一瓶足足三觔。君如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水，一斤土，一斤瓶。”

这段故事被后人不断引用，编入《笑林》。元代上海产酒的质量实在下滑得太厉害，而到了明代以后，上海的官酒生产已不见于著录。不过，不管怎么讲，历史上的上海是酒乡，而不是渔村，这是必须纠正的。

上海历史上的界路

旧上海在租界时期，有两条路中文名叫“界路”，而与英文名的路名不同。一条是今天的河南中路，它的英文路名叫Barrier Street；另一条是今天的天目东路，它的英文路名叫Boundary Road。这两条路均是以美租界与华界的分界线而得名。

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29日，清廷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涉及许多内容，其中第二款规定：“自今以来，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这就是所谓的“五口通商”。但是，条约并没有对侨民在通商口岸以何种方法获得土地、如何居住等作出规定，于是在1843年10月8日，清廷钦差大臣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年，1843-1844年出任首位香港总督）签订《虎门条约》，这是《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所以又称《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

在万年和约（即《南京条约》）内规定，允许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价必照五港口之现在所值高低为准，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

该条款已经规定，通商口岸的地方官必须要与英国领事协商，划出一块土地，专供侨民租赁、造房、居住、贸易之用。

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1894年，今圆明园路125弄，初名“巴富尔路”，即以其名字命名）抵达上海，与上海道会晤后即宣布——11月17日上海开埠。巴富尔到上海后，就将领事馆设在上海县城姚家弄租来的民宅里，除了有一部分商人从当地的农民手中购进地块，造房居住外，大部分侨民就随领事居住在城里。

在此之前，上海人从来没有看见过欧洲人，白种人与黄种人在外表上有明显的差异，在生活习惯何礼仪上也有明显的不同，所以，侨民与原住民之间产生摩擦、冲突也是难

以避免的，这对上海地方政府的官吏们来讲是最麻烦的事，他们希望英国人遵守《虎门条约》的约定，协商划出一块土地作为侨民的“居留地”(settlement)，规定侨民应该居住在“居留地”内，而巴富尔并不是不希望在上海有块“居留地”，他只是以暂居在城里作为一种手段，从上海道手里获得更大的利益。一直到1845年11月29日，巴富尔与上海道宫慕久订立《上海租地章程》，并以告示的形式向上海市民公告，告示中讲：“兹体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条约共23款，对侨民在“居留地”内的权利和义务作了规定和限制。在以后的若干年中，列强通过修改、增订《上海租地章程》的办法，不断扩大“居留地”权利，使“居留地”蜕变为“租界”，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告示中讲的“洋泾浜”是上海县城北郊黄浦江的支流，它在1914年被填筑成爱多亚路，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李家庄”是一个自然村落名，在今天的北京东路外滩，而东面就是黄浦滩，显然，告示只确定了“居留地”的三面界限。所以到了第二年的9月，英国领事巴富尔又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在洋泾浜与李家庄之间拉了一条线，作为“居留地”的西界，这里是农田，没有如河流之类的天然分界线，外国人就沿这条分界线树立了栅栏，作为“隔离带”，不久，沿栅栏被踏出一条小路，英文叫作Barrier Street，而这也是租界与华界的界线，中国人叫作“界路”。这条租界分界线仅存在2年，1848年租界扩张，它的北界伸到苏州河北岸，西界伸到了今天的西藏中路，Barrier Street不久也被正式命名为“河南路”，但在人们的使用习惯上，Barrier Street或“界路”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租界建立后有多次扩张的过程。1863年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即后来的公共租界，1899年公共租界最后一次扩张成功，它在闸北的界线大致沿今天的西藏北路到新疆路向东，经海宁路在浙江北路向北，再沿天目中路向东。而这条天目东路就是1899年租界扩张成功，并用于表示这是租界的分界线而筑的，所以被叫作Boundary Road，对等的中文路名即“界路”。1943年更名为“天目路”。1963年的城市道路改建中，决定把天目路、新民路、广肇路拓宽拉成一条直线，并经长寿路桥与长寿路相通，于是把天目路、新民路、广肇路分别更名为天目东路、天目中路和天目西路，并一直沿用至今。

上海的“界路”是租界时代的产物，随着租界时代的结束，“界路”也被取消了。不过，让后人知道旧上海曾有租界，曾有过因租界而产生的“界路”，未必是一件坏事。